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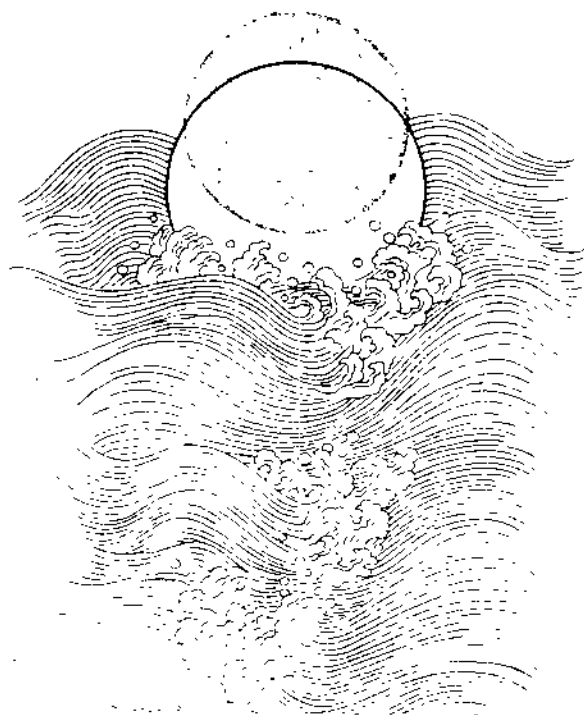
第五冊
歷史人物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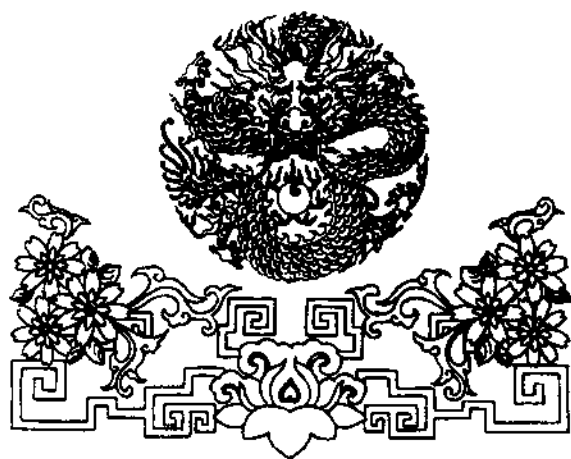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第五冊

歷史人物之旅



華嚴出版社印行



編著者：文化中國之旅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 編：蔡 君 謨
出版者：華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淑 心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03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307號

中華民國76年12月1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75	62	61	55	47	37	29	27	24	17	13	11	9	7	4	1
第二〇八章	第二〇七章	第二〇六章	第二〇五章	第二〇四章	第二〇三章	第二〇二章	第二〇一章	第二〇〇章	第一九九章	第一九八章	第一九七章	第一九六章	第一九五章	第一九四章	第一九三章
聞鷄起舞・渡江擊楫——	十六國春秋	三定江南	東晉王朝的建立	五胡亂華	八王之亂	賈后干政	愚闇	何不食肉糜——晉惠帝的	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	玄學與清談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九品中正	占田、課田與戶調制	狐媚以取天下的司馬政權	山越和夷洲	神刀和蜀錦
129	126	124	122	119	116	115	112	111	106	100	93	88	84	79	
第二二三章	第二二二章	第二二一章	第二二〇章	第二一九章	第二一八章	第二一七章	第二一六章	第二一五章	第二一四章	第二一三章	第二一二章	第二一一章	第二一〇章	第二〇九章	
唐寓之之亂	蕭齊皇朝的建立	劉宋後期的骨肉相殘	北魏南侵	劉宋皇朝的建立	門閥制度	情況	南北朝時期的江南經濟發展	佛教與道教	農業與工商業	桓玄篡立與東晉滅亡	王恭之叛與孫恩起事	謝安	淝水之戰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祖逖北伐
															王敦與蘇峻之亂
															桓溫北伐
															安石不出，如蒼生何——



錄



167	166	163	162	160	155	152	148	146	144	139	137	132	120
第二三十七章	第二三十六章	第二三十五章	第二三十四章	第二三十三章	第二三十二章	第二三十一章	第二三〇章	第二二九章	第二二八章	第二二七章	第二二六章	第二二五章	第二二四章
北齊政治集團內部的胡漢傾軋	北齊皇朝的建立	東魏與西魏的分立	河北山東關隴的起兵	六鎮之亂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北朝與北魏皇朝的建立	陳之衰亡	江南豪強勢力的再興起	陳皇朝的建立	侯景之亂	梁武帝的佞佛	蕭梁皇朝的建立	寒門將帥的興起與典籤制度的推行

245	243	228	227	218	198	195	190	187	182	176	173	171	169
第二五十一章	第二五〇章	第二四九章	第二四八章	第二四七章	第二四六章	第二四五章	第二四四章	第二四三章	第二四二章	第二四一章	第二四〇章	第二三九章	第二三十八章
隋皇朝的經濟	隋煬帝之死	全國性的反隋大起兵	楊玄感之叛	隋煬帝的黷武	隋煬帝的暴政	楊廣弑逆	掃滅南陳	施	隋文帝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	隋皇朝建國的經過	南北朝的經濟	統一北方	北周皇朝的建立

第一九三章 神刀和蜀錦

西蜀地區在卻儉以及劉焉父子統治時期，由於政治腐敗，豪強官吏「貪殘放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生產遭受嚴重破壞。三國時期，諸葛亮爲了維護蜀漢的統治，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供應軍事上的需要，在積極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也注意發展生產。此後，西蜀的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農業方面，諸葛亮確定了「唯勤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誣民財」的方針。他要求各級官吏重視農業，減輕賦稅，防止官吏過度勒索，抑制豪強任意兼併土地。平時，注意「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戰時，利用空隙時間，「休士勤農」，分兵屯田，實行「兵農合一」。

水利是農業發展的重要環節。諸葛亮對它也非常重視。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有一條九里長堤，名叫「諸葛堤」，是諸葛亮爲防止洪水冲刷低窪地帶農作物而組織人力修築的，至今那裏還流傳着諸葛亮修堤的故事。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水利灌溉網，是成都平原農業生產的命脈。諸葛亮對它極爲重視，曾

明確指出：「此堤是農業的根本，是國家的資源」。他專門設置「堰官」精心管理，還徵發一千二百名壯丁常駐堰區，負責保護和維修，提高灌溉能力，使它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手工業方面，鹽鐵生產直接關係着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收入。諸葛亮設置「司鹽校尉」、「司金中郎將」等官職，負責管理鹽鐵生產和兵器、農器的製造，不准豪強和私家開採煮鹽。

西蜀地區的煮鹽業，在漢代就已經很發達，在臨邛（今四川邛崃）、廣都（今四川雙流）、什邡（今四川什邡）等縣，都有鹽井。有的地方已能用火井（天然氣）煮鹽。從成都市郊漢墓出土的鹽井畫像磚圖像，可以看到當時鹽井生產的大體情景：鹽井在山裏，井上搭起相當高的架子，架上安着滑車；工人站在架上利用滑車吊桶提取鹹水，然後用梘筒把鹹水引入鹽鍋裏去煮製。

相傳諸葛亮曾到臨邛視察火井煮鹽情況，之後產量有所提高。這反映了諸葛亮對鹽業生產的重視。

仁壽這個地方有鐵山產鐵，諸葛亮會利用它鑄造兵器。他還「采牛山鐵」，一次就鑄劍三千多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冶煉技術的進步。有一個叫蒲元的煉鋼能手，「熔金造器，特異常法」，相當有名。

秦漢時期，人們已經掌握了淬火^①等熱處理技術，使製造出來的兵器相當堅韌和鋒利。〔漢書·王褒傳〕記載，宣帝劉詢時「巧冶鑄干將之橫，清水淬（同淬）其鋒」。三國時期已認識到水質對淬火質量的影響。蒲元在斜谷製造兵器時，發現水質不符合淬火要求，專門派人去成都取水。他給諸葛亮造刀三千把，爲了試驗刀刃的鋒利程度，用竹筒裝滿鐵珠，用刀砍筒，竹斷珠裂，被稱爲「神刀」。

經過諸葛亮的提倡和管理，西蜀的鹽鐵事業有相當發展。史書記載說，蜀漢「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

蜀錦（絲織品）是益州地區的特產。諸葛亮積極鼓勵種桑養蠶織錦，使蜀錦的生產有很大發展，出現了像詩人描述的「園闌（市肆）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的景象（左思〔蜀都賦〕）

大批蜀錦遠銷吳、魏，成為蜀漢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諸葛亮自己就曾說：「決敵之資，唯仰（靠）錦耳！」

諸葛亮既重視開源，也注意節流。西蜀地區原來奢侈的風氣很盛。官僚地主生活奢侈，甚至婚姻、喪葬，都要「傾家竭產」。諸葛亮反對奢侈浪費，提倡節儉，主張豐收之年不浪費，平時注意儲蓄，以防災荒。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比較嚴。他上表給劉禪說：「我一身在外，衣食都由國家供給。成都家中，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一家可以溫飽，不需要增加私產。我死的時候，如果內有餘帛，外有餘財，那就對不起陛下。一到也死的時候，家產

確實沒有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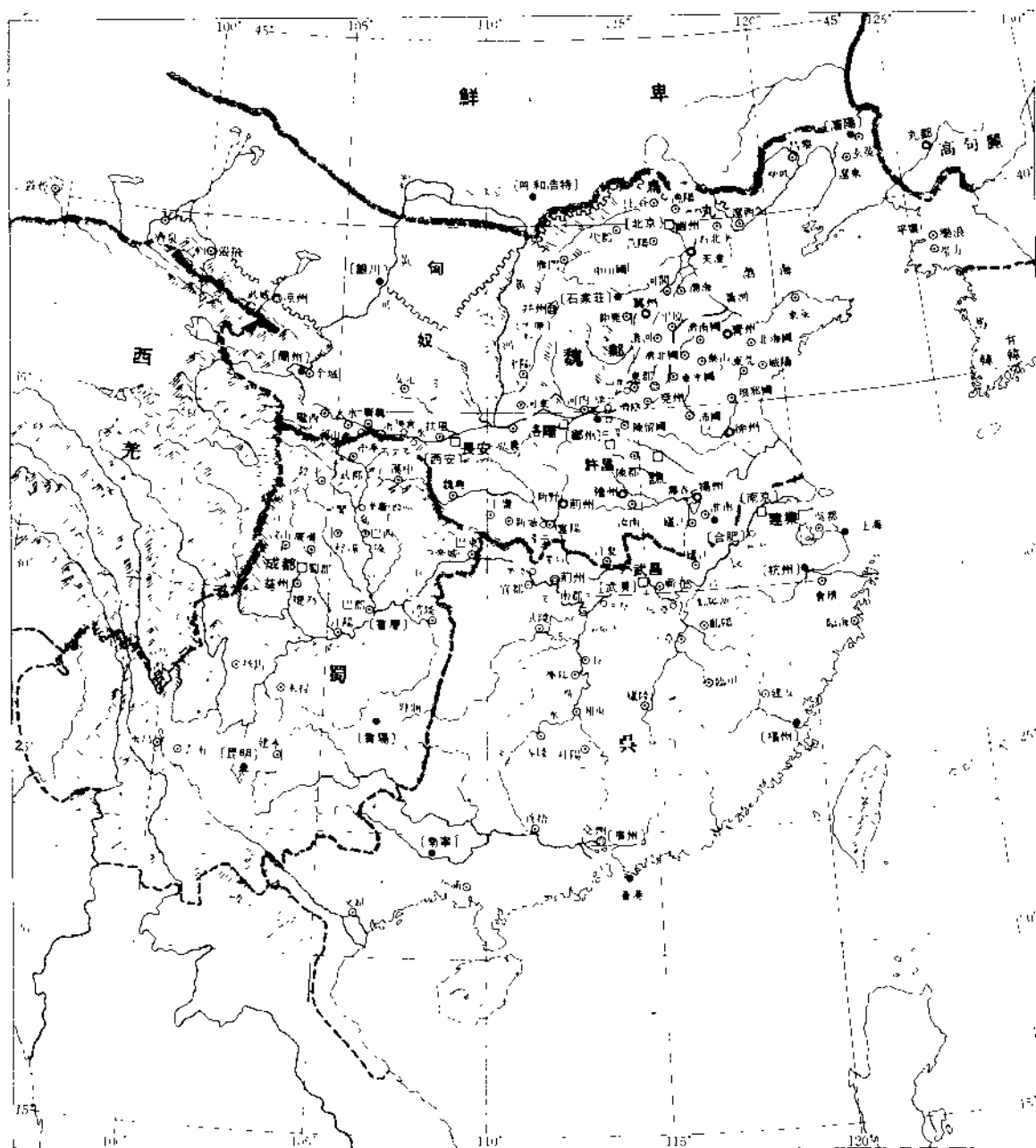
東漢時期，在當朝提倡「孝道」的影響下，厚葬成風。官僚地主們大肆營造墳墓，錢財花費之人，隨葬器物之多，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諸葛亮反對這種厚葬風氣，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他自己也不搞厚葬，臨死前留下遺囑，要求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殮時，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放隨葬器物。人們按他的要求做了。

諸葛亮提倡節儉，反對浪費，取得了相當成效。在蜀漢的將領官僚中，有相當一部份人有節儉之風。如將軍鄧艾「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大將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財無餘」

，「樂乎不倦，清素節約」，「宰割費祿」，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這些雖不免有溢美之詞，但說明在蜀漢，極度奢侈糜爛的現象不是普遍的。

經過諸葛亮的治理，貧弱的西蜀地區，出現了「田疇開闢，倉庫充實，器械堅利，蓄積豐饒」的景象，為鞏固蜀漢的統治和進行北伐戰爭，打下了基礎。

② 淬火：鑄刀劍時，把燒紅的刃往水中一蘸，以提高其彈性和硬度。



△三國形勢圖

第一九四章 山越和夷洲

孫吳佔據的江南地區，土地肥沃，雨量充足，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在漢代，這裏還沒有完全開發，地廣人稀，生產比中原地區落後。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隨着山越人的大量出山和北方漢族人民的大量南遷，江南地區的經濟有了明顯的發展。

越人主要散居在長江以南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嶺地區。

秦漢以來，不少漢族人民爲了反對剝削和壓迫，逃入越人居住的地方，和越人雜居，共同生產，逐漸融合。這些居住在山地的南方土著（不完全是原來的越人）被稱之爲「山越」。他們種植穀物，在出產銅鐵的地方，還能鑄造兵器和農具。他們強悍好武，勇於作戰，依阻山險，不向孫吳政府繳納賦稅和服徭役。孫吳使用武力征服他們，還把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編入軍隊，因此激起他們不斷的反抗。

早在二〇三年（建安八年），孫權進攻劉表的江夏太守黃祖時，豫章、鄱陽、丹陽等郡的山越就乘機起義，迫使孫權從前線撤兵，派太史慈、程普等領兵鎮壓。

後來，山越還堅持反抗，特別是丹陽郡的山越聲勢很大。

二三四四年（嘉禾三年），孫吳大將軍諸葛恪率領大軍鎮壓丹陽郡的山越人。經過三年的進攻和圍困，山越人的糧食沒有了，十萬多人被迫陸續出山投降。孫吳政府把其中丁壯四萬多人編入軍隊，把餘下的移居平原，成爲政府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

山越人的大量出山定居，加強了他們同漢族人民的接觸和融合，加速了山越經濟文化的進步，加速了江東平原的發展。

東漢末年各軍閥之間的混戰，使中原地區的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有的向西流入隴右，有的向北流入遼東，但主要是向南流入孫吳統治地區。其中，關中、河南地區的人多流向荊州。關中人民流入荊州的就有十萬多家。徐州、淮河流域的人多流向揚州。張昭就是徐州彭城人，魯肅則是臨淮東城（今安徽定遠東南）人。當魯肅遷往江東時，跟着他一同去的男女有三百多人。

北方人民的不斷遷往孫吳地區，不僅

增加了勞動人手，而且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對江南地區的開發起了促進作用。

孫權對江南地區生產事業的發展是重視的。和曹操、諸葛亮一樣，他也採用屯田的方法解決軍糧問題。東吳的屯田也分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一般設在重要防地附近，由軍隊耕種，兵農合一，平時生產，戰時打仗。民屯主要由北方南渡的流民以及遷入平地的山越人組成，採用軍事編制，由典農校尉和典農都尉掌管。

東吳最大的軍屯，是在江北和曹魏接壤的廣江郡。最大的民屯是在毗陵（今江蘇常州，毗晉皮），屯田客有幾萬人。孫吳屯田的規模，遠不如曹魏，所取得的成績也不那麼明顯。

東漢時，牛耕技術還未在南方推廣。孫權爲了推廣牛耕，親自將駕車的八頭牛改充耕牛，「以爲四耦」，組成二牛拉一犁的「耦耕」。二四五年（赤烏八年）孫權還組織三萬人在句容（今江蘇句容）開鑿破崗澮運河。運河從句容通雲陽西城（今丹陽縣境），可以將三吳（吳郡、會稽、丹陽）和都城建業聯絡起來。

在孫權的積極提倡和組織下，通過廣大農民的艱苦勞動，生產進步了，太湖沿岸和錢塘江流域，已成為經濟發達的富庶地區。永興（今浙江蕭山）精耕細作的稻田，一畝可產米三斛（石）。其它地區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孫吳的手工業也有一定發展。在冶鑄業方面，銅鏡的工藝水平相當高。會稽郡銅鏡製造業最發達。產鐵的地區設有鐵官（冶令或丞），管理採鑄。武昌附近是重要產鐵區。此外，還設有司鹽校尉、鹽池司馬等官，管理漁鹽之利。海鹽（今浙江平湖東南）是當時有名的食鹽產銷地。更值得重視的是，青瓷業在漢代釉陶的基礎上開始走向成熟。一九五四年在南京市趙岡吳赤烏十四年（二五一年）墓出土青瓷虎子（盛尿器），一九五八年南京市北京路吳甘露元年（二六五年）墓出土青瓷熊燈，和一對青瓷臥羊，在釉色上和造型上，都相當精美。從這些出土的器物看來，當時統治者日常的生活用具，一部份已逐漸為青瓷所代替。唐代越窯青瓷很有名，達到很高水平，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紡織業方面，紡麻織布是當時民間主要手工業，會稽郡的越布很有名。絲織業在政府「廣開農桑之業」的倡導下，也

逐漸興起。三吳地區是絲織業發展的主要地區，以諸暨、永安二縣絲織品的質量為最高，專門供應宮廷的需要。但整個說來，孫吳的絲織業，在產量上、技術上不如西蜀，仍然依賴蜀漢供給蜀錦。

孫吳的造船業很發達。同蜀魏在長江上的作戰以及海上交通的需要，促使孫吳大力發展造船業。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閩侯）是當時造船業的中心。政府專門設典船都尉，監督罪徒造船。造船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海船大的長二十餘丈，高出水面二、三丈，可載六、七百人，裝載物資可達萬斛（五百噸以上）。

隨着造船技術的進步，海上交通也發達起來。孫吳的海船北航遼東，南通南海。二二三年（嘉禾二年），賀達等率兵一萬，浮海到遼東。二四二年（赤烏五年），聶友和陸凱帶領三萬士兵，遠航到達珠崖、儋耳（海南島）。

孫吳的船隊還到達夷洲，夷洲就是今天的臺灣。西元二三〇年（黃龍二年），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一萬士兵，乘大船從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啓程，從臺州灣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後橫渡臺灣海峽，在今臺南市和嘉義一帶登陸。

衛溫 and 諸葛直帶領的船隊，在碧波萬頃的海面上，乘風破浪，開向夷洲。這支船隊共有大小船隻三十多艘，其中最大的船大約有五十公尺長，能載六七百人。衛溫坐在船上，想把關於夷洲的傳說弄弄清楚，就問諸葛直：「最早記載夷洲情況的是什麼書？」諸葛直說：「早在古代的重要地理文獻『禹貢』上就談到過夷洲。後來這方面的傳說就更多了，其中有趣的是徐福渡海到夷洲的傳說。據說秦始皇爲了長生不老，派徐福帶着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尋求神山仙藥。徐福曾經到過夷洲，那裏無霜無雪，一年四季草木不死。我想，那裏準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海島。」衛溫問：「徐福後來怎麼樣了？」諸葛直說：「後來這批人又漂浮到寶洲去尋找長生不老藥，始終沒有找到。他們不敢回大陸去見秦始皇，就在那裏住下來了。」

衛溫、諸葛直的船隊在海上航行了許多日子，終於到達夷洲。他們一上岸，住在海岸邊上的高山族人以爲他們是來搶劫的，就用大木棒敲木鼓，高山族的男女羣衆聽見鼓聲，都拿着用鹿角做的矛、青石做箭頭的弓箭，以及木棍等武器，紛紛跑來。衛溫 and 諸葛直一看高山族人要跟他們打仗，就趕快集合士兵，做好戰鬥準備。不一會兒，高山族的部落成員排列成陣勢，向吳軍靠近。衛溫沒等他們站穩腳跟，

就命令士兵掩殺過去。高山族人毫不畏懼，跟吳軍士兵廝殺起來。高山族武器比較落後，抵擋不住吳軍的攻勢，只得紛紛後退。衛溫也不追趕，命令收軍紮營。

衛溫正在營帳裏考慮怎樣同高山族消除誤會，建立友好關係，忽然士兵跑來報告說：「高山族代表求見將軍。」衛溫請他們進來，聽他們說明來意之後，才知道按照高山族習慣，打了敗仗要派人到對方道謝，贈送禮物，算是和解。高山族的代表道謝之後，衛溫也趕快派代表帶了禮物去回拜。吳軍代表來到高山族酋長那裏，看不到城堡等建築物，酋長居住的房子周圍，只是用木柵圍了一圈。在酋長的住室裏陳列着許多人頭骨。據說這是高山族的風俗：室內陳列的人頭骨越多，就表示武功越大。高山族酋長對吳軍表示友好，為吳軍代表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高山族男女成員穿上質地精緻的民族服裝，把頭髮盤在頭頂，用骨簪（骨）束住；脖子上戴着成串的珠子，手上戴着玉石鐲子，成羣結伴，歡呼跳舞。

三國時候，高山族還處在氏族社會的階段，他們分成許多部落，沒有私有財產觀念，部落裏的成員叫做「彌鱗」。他們按性別和年齡分工。身強力壯的男子，擔負狩獵和捕魚的任務。他們成羣地拿着棍

棒，長矛和石塊，高舉着火把，奔跑在森林草原之中，河湖沼澤之畔，追捕野獸，打撈魚蚌。他們還擔負着保衛部落財產和集體安全的任務。婦女們的主要職責，是在部落的地域範圍內，採集野生的果實種子，掘取植物的根莖，為全體部落成員準備飯食，燒好肉類、魚類、植物類的食品，平均分配給全體成員食用。她們種植五穀，還馴養豬、雞，做編織縫製衣服等工作。在高山族部落裏，一切都按照集體的意志和傳統的習慣辦事。有人犯了罪，由部落中人共同議決制裁的辦法。監禁不用枷鎖，只用繩索捆綁。輕罪用棍棒責打，重罪才處死刑。

衛溫和諸葛直帶領的吳軍士兵新到夷洲，水土不服，生活習慣不適應，許多人生了病。高山族成員熱情幫助醫治，但是不見效，病死的十有八九。衛溫 and 諸葛直只得率領吳軍離開夷洲，帶着高山族成員數千人回到了大陸。從此以後，夷洲和大陸上的經濟文化聯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其實，夷洲和大陸上的聯係，遠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了。根據近代考古發掘，在臺灣省發現了一百多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例如臺北市四山貝冢出土的石斧、石鏃（矛）、高雄市桃子園出土的彩陶，臺南縣烏頭山和新竹縣出土的黑陶，實地和

形狀都同大陸東南沿海發現的極其相似，其中有一種幾何形花紋的陶器，更具有福建一帶原始文化的重要特徵。這些遺址和文物，充分證明了臺灣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同大陸沿海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聯係，是從大陸東南沿海直接傳播過去的。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遙遠的古代，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跨海到了夷洲，在那裏居住下來，並且用勤勞的雙手開發了夷洲，發展了夷洲的經濟和文化。最早居住在夷洲的高山族人民，他們同中國其他兄弟民族一樣，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各地區各民族之間互相聯係，互相影響，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用辛勤的勞動，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創造出了在世界上堪稱先進的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

海上交通的發達，使孫吳和扶南（今柬埔寨）、林邑（又稱占城，今越南中部）諸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二二六年，朱應和康泰曾出使南海諸國。二四三年，扶南國王遣使來吳，帶來樂人和地方特產。林邑國王也遣使來吳聘問。從此，開始了中國和南海諸國正式的往來。朱應、康泰回國後，把他們的見聞寫成書，朱應寫了《扶南異物志》，康泰寫了《外國傳》，都

是了解和研究南海諸國情況的寶貴材料。雖然原書已失傳，但從別的書籍中還可以間接了解一些原書的內容。

孫權的平山越，行屯田，發展農業生產，擴大海上交通，對東吳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應該指出，漢族和山越等各族人民，雖然共同開發了江南，但享受成果的却是豪強官僚地主。三國時期孫吳地區出現了一些佔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他們「僮僕成軍，閉門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佈千里」。有的則用成千艘商船販運貨物，用上萬個糧倉儲存糧食，時間長了，甚至發霉

腐爛。許多官僚地主擁有私兵，世代相傳，形成了世襲領兵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兵士既要打仗，又要生產，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是沉重的。武將們立下戰功，可以獲得增加士兵和賜給屯田戶的獎賞。如呂蒙攻破曹魏的皖城，孫權便把俘獲的人馬分給他，並賜給尋陽屯田民六百戶，官屬三十人。呂蒙死後，孫權還賜給他的兒子守家戶三百家，並允許呂氏有五十頃土地可以不向國家繳納賦稅。

被官僚地主控制的屯田民或民戶，身份低於一般農民，有的甚至被當成僮僕使用。政府在賞賜官僚將領田宅時，往往同

時賞賜屯田民或民戶，稱為「復客」，如大將潘璋死時，孫權在賞賜給他妻子田宅的同時，賞賜「復客」五十家。「復」是免除賦役。所謂「復客」是指被賞賜的「客戶」可以免向政府納稅和服役。他們雖不必受國家的控制剝削了，但受官僚地主的控制和剝削則加重了，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前加強了。

第一九五章 狐媚以取天下的司馬政權

西晉五胡亂華的時候，有個羯族人石勒，建立起了一個後趙政權。據歷史記載，他有這樣一段故事。有一次，他喝酒喝醉，對一個喚做徐光的臣子說道：「我可同前代那一位開國的皇帝相比？」徐光恭維他道：「你比漢高祖、魏武帝都強。只有古代的軒轅皇帝，可以和你相比。」石勒笑道：「人豈不自知？你的話過份了。我如其遇見漢高祖，要北面而事之，和韓信、彭越爭先。如其遇見後漢光武帝，該

和他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石勒之評價魏武帝固然大謬不然，但說司馬父子則甚是也。

從魏武帝到司馬懿，可以說是中國的政局，也可以說是中國的社會風氣的一個升降之會。從此以後，封建道德就漸滅以盡，只顧些狡詐凶橫的武人得勢了。

〔晉書·宣帝紀〕說，晉明帝曾經問

王導：晉朝是怎樣得天下的？王導乃歷述司馬懿的事情，和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之事。明帝羞得把臉伏在案上道：「照你的話，晉朝的基業那得長久。」可見司馬懿的深謀秘計，還有許多後來人不知道的，王導離魏末時代近，所以知道得較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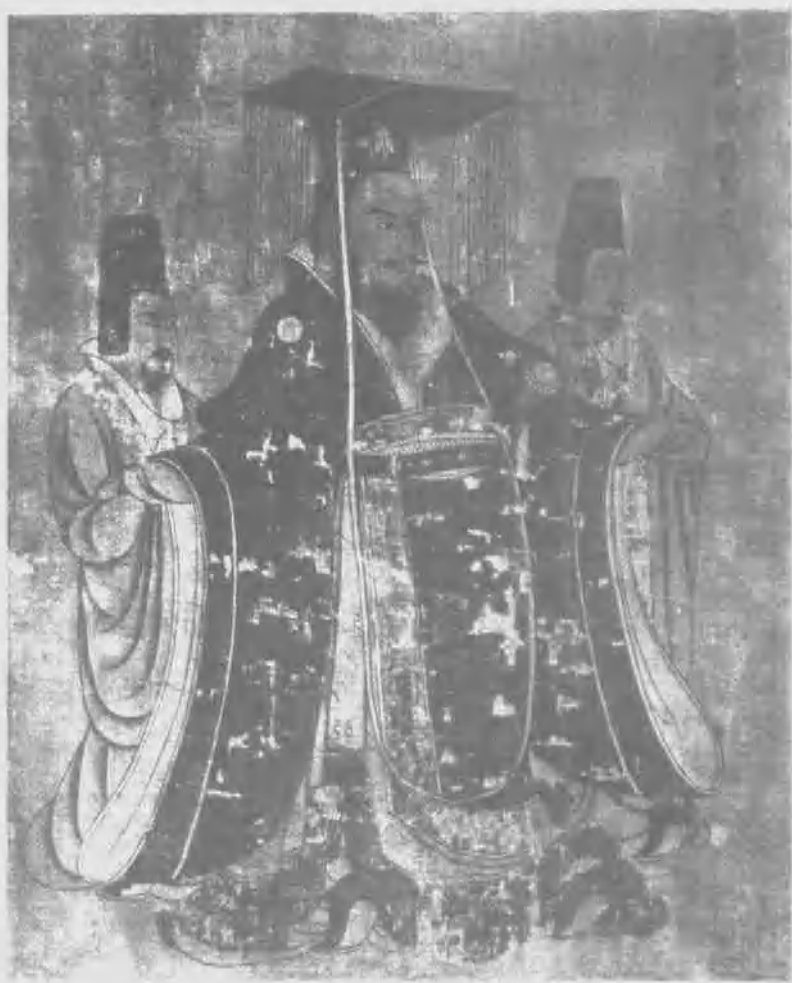
司馬懿的為人十分暴虐，他的政敵一旦被殺，都是夷及三族，連已經出嫁的女兒亦不得免。所以做「晉書」的人也說他猜忌殘忍。他一生用盡了深刻的心計，暴

虐的手段，全是爲了個人的地位起見，絲毫沒有魏武帝那種安定天下的意思。封建時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犧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馬懿却樣樣相反。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也都是這一路人。這種人成功，封建時代的道德就漸減以盡了。

其後司馬炎以大少爺的身份，承接父

祖的基業，統一中國，順理成章的做了晉朝第一代皇帝。這是一個坐享其成的皇帝，並沒有什麼「聖明英武」之處，他與臣僚談話，從來沒有聽他說過「經國遠圖」，所說的僅是些「平生常事」而已。他的生活也腐化得很，貪戀女色，後宮多內寵。等到滅亡東吳後，把孫皓的江南宮中美女妃嬪，也全部接收過來，送至洛陽，致

使後宮姬妾近萬人。他的心目中，個個女人都是美麗的，到了夜晚，也不知寢宿在哪一個妃妾宮中好。他想了一個法子，乘坐羊車，隨羊的意思，羊把他拉到哪個宮裏，他就住在哪個宮裏。宮人爲了要吸引羊向她的宮裏拉，就用竹葉插在門戶，用鹽汁灑在地上，引羊前往。試想皇帝的生活，是如何的糜爛？因而，上行下效，臣僚們的生活，也跟着荒淫而墮落了。



△晉武帝司馬炎像

第一九六章 占田、課田與戶調制

西元二六四年（咸熙元年），司馬氏下令廢除屯田官。之後十六年，即西元二八〇年（太康元年）滅吳統一全國後，西晉政府頒布了占田、課田和戶調的法令。這是西晉時期重要的土地和賦稅制度。這個法令規定：每一個男子可以占田七十畝，女子可以占田三十畝。其中每個丁男（十六歲到六十歲）要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十三歲到十六歲的少年和六十歲到六十五歲的老人）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田。由於史書記載不太明確，所以關於占田和課田的關係，歷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課田即包含在占田數額之內。所謂占田，是政府規定農民占有土地的一個假定指標，並不是由政府按照這個指標分配土地給農民，實際上是可能占有這個數量的土地，政府是不管的。所謂課田，就是徵課田賦，即規定每個丁男、丁女、次丁男所必須向政府交納田租的法定指標。不論占足土地沒有，政府就按這個指標向農民徵收田租。可見，占田數只是一個限額，而課田數則是固定的。

課田的稅收是多少呢？史書記載課田

五十畝，收租四斛。按這個數折合，平均每畝交租八升。我們知道，曹操時曾規定一般農民需向政府交納每畝四升的田租，可見在西晉課田制下的田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之多。

農民除了交納田租以外，還要負擔沉重的「戶調」。所謂「戶調」，就是政府以戶為單位向農民徵收的賦稅。西晉政府在頒布占田、課田令的同時頒布了戶調令，規定：丁男作戶主的，每年要交納絹三匹，綿三斤。婦女或次丁男為戶主的，折半交納。邊遠郡縣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戶調的剝削，比曹魏時期的絹二匹、綿二斤來，增加了三分之一。

不過，上述田租戶調的數額，只是一個平均數，是交給地方官統計戶口的徵收的標準，在實際徵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為九等，按等收稅，稱為「九品相通」。這樣又造成一個漏洞，使有財有勢的豪門大族得以勾結官府，在評定家資等第時上下其手，降低等次，「從富督貧，避強侵弱」，把大部分負擔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

在頒布占田制、戶調制的同時，西晉政府又規定了品官占田蔭客制。規定官吏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頃，以下每低一品，遞減五頃。此外，各級官吏還可以占有戶數不等的佃客，最高十五戶。法令還規定士族官吏可以蔭庇親屬，多的可到九族，少的可到三世。這些被蔭庇的人戶，不在官府立戶籍，可以免除對於官府的徭役和租賦，但他們却成了官僚地主的依附民，對於封建主有着極強的依附關係。這種蔭客制度是世家豪族地主的一項重要特權。品官占田蔭客制的頒布，一方面表明西晉政權承認漢代以來世家豪族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的既成事實，而且通過法律形式把它進一步鞏固下來，用以保障世族門閥的經濟特權，這就很清楚地反映出西晉政權門閥特質。

西晉的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是承襲曹魏的制度稍加變動而來的。占田制是在屯田制破壞之後發展起來的。屯田制破壞以後的屯田戶，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他們原來所耕種的官田，現在成了私田。戶調制也是由曹魏租調制演變而來的。世家豪

族早就從政府那裏得到一租牛客戶的賞賜，同時憑借權勢侵占官田和招募逃亡，這就是品官占田蔭客制的由來。

西晉政權既是在世家豪族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自然要維護他們的利益和要求。西晉的田賦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反映世家豪族地主利益的制度。從上述的規定可以看出：世家豪族地主占田的數額遠遠超過勞動人民占田的數額。而實際上，對於官僚地主來說，占田是沒有限額的。占田令公布後不久，有人建議限制王公以下私有奴隸的數額，有個官僚李重反對，說：「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一可見他們私有土地的數量是沒有限

制的。事實正是這樣。強弩將軍龐宗因犯法被沒收的田地即達二百多頃。廣陽土司馬睦在所封中山國內招誘逃亡，私占七百餘戶依附農民。有個大官僚豪族王戎，「園田水碓，周徧天下。」富豪石崇被殺後，官吏抄家時發現他的帳本上登記着「水碓三十餘區……田宅稱是」。在他的田莊裏，光是蒼頭（奴隸）就有八百多人。這些豪族地主就在這種田莊裏過着驕奢淫佚的生活。

同樣是占田，性質却是截然不同的。占田令對於勞動人民來說，不過是政府爲了更好地控制勞動人手，保證租稅徭役的枷鎖而已。據史書記載，三國時一共只有

一百四十六萬餘戶，人口七百六十七萬餘，而西晉最盛時全國共有二百四十萬九千八百餘戶，一千六百一十六萬多口，戶數增加了一百萬，人口增加了一倍。這不完全是人口自然的增長，而是西晉田賦制度要求加強戶口統計造成的結果。西晉政府爲了增加稅入，還拼命強迫農民擴大「課田」數，使得土地耕種經營越發粗放，單位面積產量下降，有的收穫還不够抵償種子。農民不堪這沉重的稅賦，不得不拋棄土地，逃亡他鄉。結果是「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這些逃亡農民，匯成巨大的流民隊伍，不斷發生變亂，加速了西晉政權的崩潰。

第一九七章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九品中正

「九品中正制」（也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

東漢末年，在時局動盪不安下，士人流散各地，鄉、亭、里組織遭破壞，致使秦漢以來的以「鄉舉里選」為主要根據的「察舉徵辟制度」，事實上已無法實行。

「察舉」，就是地方官考察選拔人才，向中央推薦。「徵辟」，就是封建王朝直接徵聘人才。西元二二〇年，曹操的兒子魏王曹丕掌權時，採納潁川人、吏部尚書陳羣的建議，在各州郡設立「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州郡的士人，分別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級，稱為「九品」。「中正」在評定人物品級時，主要是先考慮祖先做過什麼大官，有幾代人做過官，謂之「家世」，也稱「品」，然後再看本人的才德，謂之「狀」。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狀」如何，劃分品等，然後向當時主管選擇官吏的吏部推薦。吏部根據中正的報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職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負責向吏部

推薦升降。這種以「中正」為中心，論品定級，選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反映了世家豪族勢力的高度發展。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來，豪強地主力量迅速擴張。他們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職，並依仗政治特權瘋狂兼併土地，建立起規模巨大的塢堡莊園。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在彌平黃巾之亂的過程中，進一步擴充力量，成為武裝割據的大小地方實力派。三國時，魏、蜀、吳分別依靠豪強大姓各霸一方。曹操雖然打擊過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他也廣泛搜羅了一大批名門大姓為己所用。當時著名的豪強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許褚、荀彧、荀攸、郭嘉、陳羣、司馬朗、司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權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繼位為魏王後，為了代漢自立，進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協，以換取他們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適應這種政治需要而確立的。

從曹魏時，就對世家豪族這樣隆重的尊奉，到了司馬懿時，當然不會廢除，而

且更要推行得積極一些，以取得世家豪族的擁護。

在司馬懿當權的時候，夏侯玄曾勸他減削中正官的權力，司馬懿不敢，他怕得罪大世家豪族，對他是有害無利。相反，歷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都是高官厚爵應酬着世家豪族，使他們對司馬氏政權向心。由於大權抓在司馬氏手中，原是擁曹的世家豪族又轉而擁司馬了。到司馬昭時代，擁曹的世家豪族幾乎已絕了跡，朝中全部世家豪族，都站在司馬氏這一邊了。

晉朝建立後，武帝對世家豪族更優待，連侵剝百姓、欺騙朝士的死罪，也能找出地位低下的人來頂缸，處罰小世家豪族，寬容大世家豪族。有一位大世家豪族胡威，看這樣下去，大世家豪族人人都可任意犯法，就勸武帝說：「陛下行政，不可太寬。」武帝說：「朕對中級官員，從來並不假借。」胡威說：「臣所說的，是指臣這一等級的人士，並非說的中級官。整肅法令，必須從臣等開端，而始生效。」晉武帝却不敢對胡威這類人整肅。如山壽

、司馬睦、武陔、劉友等私佔官稻田，經人告發，武帝就把罪名完全推在較小的世家豪族劉友身上，山濤等三人皆不犯罪。武帝這樣做，當然大世家豪族衷心的擁護他。

實行「九品中正制」，為世家人族長期操縱政權提供了保證。「中正」一職，位居權要，一般都是由官居高位的「舊姓大族」來擔任。他們控制了評定人物的大權，當然不會真正按才能選官，而只會是單純以家世聲名的高低決定取捨。「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維護大族權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這一特權，世代壟斷了做官的權力。到了晉朝已經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況。曹魏時期的許多家族，直到兩晉南北朝始終衣冠不絕。曹魏的司空崔林、盧毓，將作大匠鄭渾，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則與進入中原的鮮卑貴族合流，成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強宗。曹魏的太傅王祥、典農中郎將謝瓚的後人，即有名的王導及謝安，在東晉時分別位至丞相、太傅。王、謝兩大家族，是晉室東渡以後，權傾江南的巨族，被時人並稱「王謝」。這兩大族活躍於南朝，多次參與政局演變，一直扮演著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從法制上正式肯定了東漢以來士族壟斷官位的事實。推行這種制度，又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東晉司馬氏政權，在實行「九品中正」的同時，還在法律上承認官僚上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蔭庇親屬等特權。其多的可以蔭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蔭庇蔭三世。這些受庇蔭的人，他們免向政府納租稅、服徭役，而是把租稅、徭役，納獻與庇蔭的主人。

大的世家豪族可以庇蔭人，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室）、先賢的後裔，都能按照自己的門第，多多少少庇蔭親屬與族人。這裏面弊竇叢生，有些根本不是族人、親屬，也被冒認而予以庇蔭，從中取得好處。這些措施，不僅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質保證，也使大族更便於放手地封山占澤，吞并土地，肆意擴張自己的勢力。

全憑世資取官的「九品中正制」，從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數比士族要多，而且隨着局勢的發展，他們的經濟力量也日漸擴大，自然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適當的改變。所以，南北朝的各個政權所行的「九品中正制」不

盡相同，有時還會暫時停止實行一段。這也是庶族地主與士族地主衝突發展和庶族地主不斷壯大的反映。

到了隋朝，罷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創立「進士科」，開始實行科舉制。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舉取仕辦法，正式完成從「九品中正制」到科舉制度的過渡。這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從此歷經宋、元、明、清，科舉制度成了地主入仕的基本途徑。推行幾個世紀的「九品中正制」，終於隨着士族地主的完全衰落，而結束了。